

壹、前言

21 世紀以來，全球性的教改鏈業已啟動，國際組織（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在有關學習的宣言中提醒各國，21 世紀的關鍵能力在於學習，教育領域回歸以「學習」為研究核心，主張把學習權交還給學習者。對於人類學習的研究也邁向新視野，且同時探究正式或非正式學習情境中的學習機制。近代的學習理論，也視「成為全人」為重要的學習意義與學習目標所在（Jarvis, 2009; Mezirow, 2009），追求意義感是重要的學習動機（Illeris, 2009），創造意義（meaning making）也是學習力（learning power）的主要指標之一（Deakin Crick, Broadfoot, & Claxton, 2004）。

華人向來重視「學習」的價值，對於文化中的重要價值，例如成為能人的成就價值、成為智者的知識價值、修持成佛的宗教價值等，都需要透過學習才可達成；因而學習具有文化性，也有其「文化腳本」(cultural scripts)。所謂「文化腳本」是指運用後設語言 (meta-language) 為媒介，以簡潔、準確、易懂的語言解釋文化；它也是作為表達文化的規範、價值及實踐的新手法（Goddard & Wierzbicka, 2004）。以下將試著以「文化腳本」的理念來說明華人歷史中學習的意義，以及學習對華人的影響及其與生命意義的連結。

一、「讀書」的文化腳本：鑲嵌於生命脈絡的意義

首先，從華人的歷史建構，如「士階級的變化」、「科舉制度的發生」說明「讀書」的文化腳本。俗云：「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孟母三遷」、「鑿壁偷光」等都顯示，華人文化建構了「勤於學習」，甚至「唯有讀書好」的意向與氛圍。

文崇一（1989）指出，傳統華人的社會具階層性，最大的成就是做皇帝，其次是當中央或地方的官員，再次為士紳、地主。依此論，除皇族由世襲或改朝換代可得之外，一般社會大眾能夠達到的最高成就就是「官吏」、「士大夫」階級。基於這樣的結構，在傳統封建社會中人們往往朝「讀書」方向走，以進入「士階層」為榮。「士」階級又象徵著什麼呢？余英時（1987）認為「士」的意義是「道」的承載者，儒家與諸子百家將「道」推至崇高的位置。至於「士」的具體內涵為何，南懷瑾（2009）認為「士」是指一個讀書人，必須在學識、智慧及道德的修養上達到身心和諧自在、法內外兼通的程度；也是黃光國（2009）所指之華人的三種自我實現：仁道、修身以道、濟世以道。如此看來，傳統的「士」之意義與現今華人的自我實現、修身意涵具有一致性。既然兩者意涵相近，那麼「士」本身的演變與此一階級人所承載的「道」概念，已然影響了古今華人的生命觀，且對於現代華人也有某種程度之關聯。

另外，若從傳統中國的制度面來觀察，由於科舉制度啟動了「由士入仕」的階級流動程

序，也讓「士」的意義產生了變化（李弘祺，2003）。科舉制度是一種文官制度，始於隋煬帝，在中國歷史上存在 1,300 多年，對於中國社會與文化有深遠之影響。例如，吳宗國（1997）與金諍（1990）均指出，唐朝的科舉制度以「詩賦」取人，因而影響了唐代的詩歌總量，成了中國詩歌史上的頂峰；《全唐詩》共蒐集唐詩近五萬首，比從西周到隋代年間流傳的詩歌總量還多兩、三倍，且唐詩之內容繁富、風格多樣，傳頌於後代者眾多。科舉制度更影響宋代的「士人」風格，楊懋春（1986）指出宋代自開寶 3 年（970）開始增加科舉的錄取名額，且給予錄取者優厚的待遇，使得「學而優則仕」、「唯有讀書高」的思想深入人心，大開選才取士的門風；宋代平民間更是有詩歌如「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的流傳，描述宋代社會人人都在念書的情境（劉海峰、李兵，2004）。清代小說《儒林外史》中的范進中舉，即描寫一個讀書人從年輕考到 80 歲，同時諷刺當時讀書人為求功名的諸多荒謬現象。簡言之，因應士階級變化或科舉制度的產生，傳統中國社會到處瀰漫著重視讀書與考試求功名。

重視讀書的現象延續至今，深入現今社會即所謂的「濡化」（enculturation）現象。「濡化」，作為心理學的學術名詞，係文化適應之意（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指的是價值觀與文化規範受社會成員傳承或習得之過程；也是個人不斷地在社會中學習如何適應其環境。藉由讀書功成名就的思維在華人文化裡深遠存在，因濡化作用甚而產生現今社會的「文憑主義」（王震武，2002）。也就是現代社會的華人也有崇尚學歷，不顧一切也要追求學歷的「學歷病」，除了文憑本身，更在意文憑背後所代表的社會地位（功名）與「名聲」。王震武（2002）更深入分析，「文憑」及「資格」會產生信賴與尊重，具有新的意義，最為顯著的莫過於變成獲得社會職位的基本條件及代表社會地位的依據。此現象也使得華人在讀書生涯中產生「名實分離」，教育本身的求知功能不受重視，而它所附帶的社會報酬才是眾人關心所在。余安邦（1994）研究華人的成就取向時也指出，華人大傳統文化的「立德」、「立言」、「立功」較為偏向儒家「修身」的概念，而小傳統文化的「求名」則是「對功名與聲望的追求」、「對財富與利祿的企盼」、「對傳宗接代的延續」，是較為現實人生取向的，也是驅動不斷升學與學習的重要原因。

總之，現今華人社會的重視讀書，係延續文化傳統而來，無論是從「士」的社會位置、意義及演變，從「科舉制度」的出現，還是儒家道統、修身的角度，或是現代自我實現的意涵，在在顯示這些因子交織重疊在歷史與文化中，華人社會確實存在讀書的文化腳本，且與華人的生命息息相關。那麼，意義又為何呢？

二、意義的特性

現代心理學中，意義（meaning）大多集中在生命意義之論述。Frankl（1985）指出每個人的生命均有特別的目的與意義，意義以價值呈現且反映了社群特性。Crumbaugh（1973）認為意義能賦予個體存在的方向感與目標，並藉由實現目標讓個體獲致「有價值的人」之認同。Baumeister（1991）則認為意義是「共同的表徵於連結個人的事、物及任何人的關係」，也提供了個體方向與先前的意圖。爾後，意義都離不開提供個人存在的理由、個人的承諾、價值